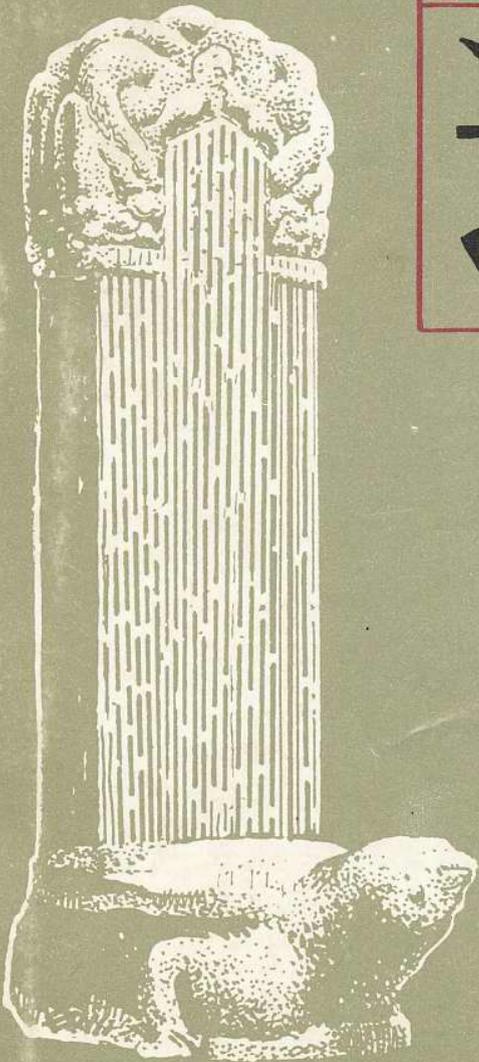


019800

扶  
余  
县  
文  
物  
志



# 扶余县文物志

主 编 陈相伟  
李殿福

一九八二年九月

封面设计：刘宣堂

# 《扶余县文物志》编写小组

## 名 单

- |     |                |
|-----|----------------|
| 王 侠 |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
| 何 明 |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
| 杨再林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
| 朴龙渊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
| 赵南实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管会    |
| 朴润武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
| 王仁富 | 白城地区博物馆        |
| 韩光烈 | 扶余县文化局         |
| 张静岩 |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化局 |
| 郑首杉 | 九台县地名办公室       |

## 序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我国历史悠久，地上地下遗存异常丰富。那些凝结着我国古代各族人民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的文物，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用志书的形式，将一个县的历史遗迹和文物科学地记述下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同时，也会起到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作用。编史修志，表现了一个国家的进步和文明，是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扶余地处松嫩平原南端，三江环绕，地腴民勤，历史悠久。得胜丰碑，举世瞩目；明清驿道，闻名遐迩。众多的辽金时期的古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伯都古城及其周围的几座小城，在辽末金初的民族大争斗中曾起过重大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建国以来，在广大专业工作者和群众的努力下，扶余县历史发展的脉络日渐清楚，大量的历史遗迹和文物表明，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璀灿夺目的古代文化，其后，鲜卑、扶余、勿吉、靺鞨、契丹、女真、汉等众多民族又以此为舞台，不断融合、争斗、交流，共同推动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指示，在省文物志编写委员会的领导下，省《文物志》编写试点培训班扶余分队的同志们自四月下旬起到六月上旬，对扶余全境进行了全面地文物普查。同志们不辞辛苦，迈开双脚，走遍了全县每一个角落，共调查古城址17处，古遗址70处，古墓葬9处，行程4000余里，形成近20万字的基础材

料。这些来自实践的科学资料，是编写文物志的可靠基础。

田野普查结束后，为了充实材料，完成初稿，一部分同志在长春继续工作。同志们查阅近百万字的文字材料，使条目日臻完善，基本达到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要求。

文物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众人智慧的结晶。没有建国以来多次在扶余进行过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的同志所做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没有多年来那些兼职和专职的文物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文物的热爱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的编志工作将无法开展。本志初稿由编写小组的同志分头执笔，集体讨论形成。除编写小组全体同志以外，还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呼国柱、千太龙、徐学锋、李正凤、金永源、李果钧同志；通化地区的王光普、张殿甲、杨立新同志；长春地区的邹士魁、刘建宁同志；白城地区的王国学、郑新城、陈浩军、郭珉同志；省文物工作队的程健民同志。插图为朴润武、张静岩二同志绘制，图版照片为李玉成、谷德平、赵长春等同志拍摄。

在普查和编写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省博物馆、省革命博物馆、省考古研究室、省图书馆、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白城地区文管会、白城地区博物馆、扶余县政府、县政协、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档案局、民政局、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地援助，在此表示感谢。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编写文物志工作，虽然有热情和信心，但因缺乏经验，能力和水平都有限，书中一定存在很多缺点和错误。我们恳切希望专家、学者、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扶余县文物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二年九月

## 凡 例

一、扶余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本志择其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重点，分为历史考古、革命文物、人物传、表、大事记五章编述之，共八万余字。

二、第一章历史考古，共分六节：遗址、城址、墓葬、交通与建筑、碑刻、珍贵文物。前五节按时代顺序分述，珍贵文物按质地、时代分述。原始文化遗址和历代城址，是研究东北各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全部收录。辽、金、元、明、清遗址众多，选具代表性的录之。墓葬较少，科学清理的更少，择其具有时代特点录之。清代寺庙，具有历史、艺术价值，建筑学上别具一格。建国初，大部分被毁。所剩寥寥，于文化革命中又几乎殆尽。本志将无存寺庙资料，以附录收之，以供研考。

三、第二章革命文物，分事件、文物、纪念地三节。发生在扶余县有重大历史意义及影响的事件；标志一个时期重大社会内容的文物；与重大社会变革有关的建筑和地址，则录之。

四、第三章为人物传，收录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著名战斗英雄。

五、本志依据历史文献、文物普查材料、考古资料结合现状编述。因遗存甚多，工作中难免存在漏误之处，望予指正，以便修订。

六、编述内容，遗址包括地点、地理形势、范围、形制、现状、保护情形以及历史、科学、文化价值。文物包括地点、形制、尺寸、历史、艺术价值。

七、编述力求文字简洁、通俗易懂，为描述准确的增强科学

性，间以专业术语。

八、本志图文结合，文字记述为主，辅以照片、平面图和拓片。

## 扶余县文物概述

扶余地处我省北部，是松嫩平原的一部分。县境三面环水，形成近似菱形的冲积平原。东和榆树接壤；东北以拉林河为界与黑龙江省双城县相连；西南以第二松花江为界与前郭、农安、德惠为邻；北隔松花江和黑龙江省肇源县相望；西北隔松花江与大安县相对。全县东西长约130公里，南北60公里，面积5540平方公里。全县现辖5个镇（扶余、三岔河、长春岭、陶赖昭、五家站），32个公社、2个农场（华侨农场、伊家店农场）。

扶余地形受水流影响较大，自然形成坎上坎下，台地坎大多沿江平行，形成独特的地貌。

扶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沿江一带水草丰茂，是古代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

扶余历史悠久，地下地上遗存十分丰富。建国以来，文物考古事业得到不断发展，经多次普查，共发现古遗址71处，古城址17座、古墓葬9处、古碑刻1处、近代桥梁1处、采集、征集各类珍贵文物千余件。这些宝贵的资料表明：“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证明了扶余的历史文化与中原历史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血肉联系。

文物工作者经过努力，用已取得的资料，初步勾画了扶余历史发展的脉络。

建国以来，扶余不时发现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化石。1959年五家站发现了猛犸象化石，1982年，扶余镇郊小窑子屯出土了披毛

犀上颌骨。猛犸象和披毛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4万年）与人类共生的动物。这些化石为在扶余境内寻找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存，提供了线索。

六十年代初期，在五家站沿江台地上，人们曾“采集到打制石片和细石器遗物。”<sup>①</sup>这是发现的扶余最早人类活动的孑遗。人们见到了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端倪。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初（春秋至汉），扶余的原始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水草丰茂，渔猎方便，近水源而又不受水害的河边台地，按考古文化内涵，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分属两个不同的时期。

新民公社老方家地遗址时间最早，约在春秋至战国时期（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陶器多夹细砂，手制，火候较低。器形有鬲、鼎、罐、钵、壶等。纹饰有篦点纹、绳纹、锥刺纹和划纹。细密地篦点纹组成了各种不同的几何形图案。遗址范围较大，遗物较多，表明人们已过着较稳定的生活。鬲多鼎少，几何形纹饰趋于简化，没有红衣陶等特点，表明这种考古文化晚于“汉书一期文化”<sup>②</sup>（西周至春秋），而早于“汉书二期文化”<sup>③</sup>（战国至汉）。

在县西北第二松花江畔的坎上坎下，集中了几处原始文化遗址。伯都公社长岗子遗址是其代表，与之相同的还有杨家沟遗址、新民公社的腰岗子遗址、熊家亮遗址、朝阳公社的老牛圈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战国至汉（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初），属于“汉书二期文化。”在这个时期，铁器出现了，尽管数量很少，但它是生产力水平出现飞跃的标志。生产工具有石器、蚌器等。各种圆形陶纺轮和上有交叉凹槽的卵形大网坠，具有鲜明的

<sup>①</sup>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第1期。

<sup>②③</sup>：见“老方家地遗址”条目。

特点。陶器多泥质红褐陶，手制、火候不高。红褐陶器形有鬲、鼎、罐、钵、壶、杯、船形器、器盖、支座等。纹饰以绳纹和各种压印纹为主，绳纹多饰在器身和器足。

泥质红衣陶数量较多，素面。器形有壶、钵、碗、杯、罐。红衣陶具有独特的考古文化色彩，主要分布在嫩江下游、第二松花江下游和第一松花江中游的巴彦、宾县一带。而与嫩江、洮儿河流域的昂昂溪文化和吉林地区的西团山文化迥然不同。

这类遗址中遗物所反映的经济面貌与老方家地遗址基本相同，而村落居民生活的稳定性和生产力水平则大大前进了一步。

与长岗子遗址年代相同，但文化类型不同的，是社里、新站、五家站一带第二松花江北岸的几处原始文化遗址。这种类型的遗址有：社里公社鸡爪沟遗址、新站公社东井南城子遗址、西井西南城遗址、五家站公社大李坨子遗址，五家站镇南园子林场遗址（又名杨家岗子遗址）、大三家子公社南坨子遗址。遗物中虽有红衣陶，三足器有鼎，但不见绳纹陶和鬲，这一特征与农安田家坨子遗址很相似。

扶余的原始文化遗址，尤其在“汉书文化”类型的遗址中，鼎和鬲等三足器很普遍。鬲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6千年）就出现在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我国边远地区受中原影响越来越深，远至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一带都有鬲出现。而在扶余，中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强烈。

扶余与大安一江相连，但大安、洮安盛行的细石器，在扶余则极少见。这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弱的时代，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扶余所处的松嫩平原，成为不断兴起的北方民族之间争逐、调动、迁徙、融合的大舞台。东胡语族的

鲜卑人与涉貊语族的扶余人及肃慎语族的勿吉人等，频繁往来，纷争不已，表现了这些民族由氏族社会迈入阶级社会时的剧烈变革。历史的横断面和纵向脉络极为复杂，因为工作开展得不够，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文物，或者因为研究水平有限，已经见到了实物，但还不能认识它的历史面目。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空前统一的强盛时期。唐代，在东北白山黑水间兴起的粟末靺鞨贵族建立的渤海国，是隶属于唐朝的地方封建政权（公元698——926）。渤海西部与契丹接壤，疆域达到嫩江一带。1982年，文物普查队于伯都古城内，发现了三块莲瓣纹瓦当残片和一些佛像、佛饰残块。伯都古城的莲瓣瓦当，在风格、形制和构图上，更接近西安附近的唐代瓦当。佛像、佛饰残块与渤海中心地区的寺庙遗物，风格一致。这是我省唐代渤海文物最西的一个出土点，为了解渤海西部边界，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也将扶余有确切行政区划和纪年的历史，由辽代提到唐代，提前二百余年。

扶余在唐初，属室韦达姪部。《新唐书·东夷列传》：“达后，室韦种也，在那河阴，冻（涑）末河之东，西接黄头室韦，东北距达末娄。”达姪部分布在嫩江及东流松花江之南，北流松花江口，既今扶余一带。唐在节度使下设置官员，管理渤海事务。扶余在渤海时期，属莫颉府。

辽是契丹贵族联合其它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大抵辽圣宗时（983——1012），每年春季皇帝到长春州（今前郭县塔虎城）的渔儿泊（今大安县月亮泡）捕鹅，混同江（扶余县西北三江汇合处）钓鱼，称之为春“捺钵”（游猎行帐），扶余西部沿江一带，是辽的重要地区。

十世纪初，松花江中游阿什河畔的女真人，逐渐强大起来，那里是金朝肇兴之地。近于阿什河的来流水（拉林河）两岸布满了女真村落。六十年代初，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拉林河右岸的

五常、双城两县，共调查金代城址十一处，金代遗址主要有九处。这些城址“从形制、规模及出土遗物看……它们近于金代早期的可能性很大。”①1982年，省文物普查队于扶余拉林河左岸，自蔡家沟公社至伊家店公社，共发现金代遗址十七处。这些遗址相距不超过10华里，出土遗物基本相同，它们是始于辽末的女真村落。《金史·谢里忽传》：“及来流水乌萨札部……”。扶余东北部的拉林河畔，是金女真乌萨札部的家乡。

扶余在辽代隶属于东京道宁江州。金代，得胜陀一带为上京近畿之地，属会宁府（今阿城），其余地方为隆州（今农安）辖境。

辽代，扶余是契丹人和女真人接壤交往的重要地区，辽统治者建立了很多城镇，这些城镇是当时行政、军事、经济的中心。经调查共有城址十七处：伯都城、杨家城、新安城、石头城子城、土城子城、小城子城、韭菜城子城、贾津沟子城、下岱吉城、班德城、半拉城、四道门城、南城子城、西南城子城、朱家城子城、隆科城、王家屯城。这些古城，大多始建于辽，金代沿用，金代和明代也建了一些城。

古城方正、整齐，有坚固高大的城垣，有瓮门、马面、角楼、护城河等防御设施。城内建筑众多，出土大量瓦当、鸱吻、勾滴、布纹瓦、定窑瓷片、辽白瓷片、辽三彩瓷片、白釉黑花瓷片、黑釉缸胎瓷片、兔毫釉瓷片、酱釉瓷器、轮制硬质灰陶片及唐宋铜钱，这些丰富的遗物表现了当时经济的繁荣。

风华公社出土的金代“上京隆安劝农付使印”，“都弹压印”，大洼公社出土的“卜鲁哥乌主谋克印”，新城局公社出土的“利涉县印”，均九叠篆文阳刻，形制与宋代官印相同，反映了金代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的状况，说明了金政权的建制和分布。

①孙秀仁、朱国忱：《黑龙江拉林河右岸考古调查》、《考古》1984年第12期。

资料表明，辽金城的规格，周长在四公里以上的属于府城节度使州州城，刺使州州城一般不足三公里，比较小的则是当时的县城。扶余辽金城址中，伯都城周长3212米，石头城子城周长1900米，朱家城子城周长1438米，中外学术界对这三处古城议论较多，主要是辽代著名的宁江州治所和出河店究于何处的问題。有人认为石头城子城是宁江州，①有人认为在伯都城，②有人认为出河店是朱家城子城。③

辽、金遗址众多，多分布在三江沿岸的台地坎附近，县内腹地则较少。遗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认识辽代契丹人和女真人活动区域和判定遗址沿袭的年代提供了实物证据。

契丹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契丹人烧制了如鸡冠壶、鸡腿坛等生活器皿。扶余的辽代契丹人遗址，多集中在县西部、东南部，中部则逐渐稀少。三义公社万发街遗址出土的绿釉鸡腿坛口沿，是扶余罕见的辽代典型器物。

农业是女真人社会经济的基础。金代铁农具的形制，与中原地区的十分相似或一致，与元代王祜《农书》所绘农具图几乎相同。④这些记载和考证得出的结论，在扶余东北部金代遗址中都得到了印证。遗址出土了铁犁、铧、锄、铡刀、镰、镞、石臼、石磨、六耳铁锅、六耳铜锅、铁刀、镞、白釉黑花瓷片、轮制硬质灰陶片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武器，其形制与中原相同。大批先进的铁制农具，表明了金代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特点。

根据契丹人和女真人不同的经济特点，将扶余的辽金遗址，可分为三个区域。县西部和东南部是辽契丹人活动的范围，其东可

①《吉林通志》沿革志。

②李健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③山上次男：《金代女真之研究》。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达县中部的三井子、二龙一带，以纵贯县境中部的贾津沟子河上下游为界。县的东北部拉林河畔，自拉林河与松花江汇流处到蔡家沟万家坨子，这一带遗址，以徐家店公社石碑崴子为中心，沿江依坎分布，这里是辽代女真人的世居之地，女真反辽的根据地。而县中部大林子、肖家、弓棚子等地的金代遗址，则是金代中后期建立的。

拉林河与松花江汇合处，有一片广阔的冲积平原。通过考古调查，可以得知这一冲积平原形成的时间下限。这一带土质肥沃，素有粮仓之称，是古代人类生息的理想之地。但没发现任何类似县西北部长岗子一带原始文化的遗物。十几处遗址全为辽末女真人村落，说明在辽以前，这里洪水泛滥，河流改道，一片汪洋，不宜人类居住。

“大金得胜陀颂碑”座落在拉林河畔石碑崴子村东的河滩岗阜上。碑址是1114年9月（辽天庆四年）阿骨打誓师之地。1185年（金大定二十五年），金世宗为纪念先祖的丰功伟绩而立碑，迄今797年。碑阳为楷书汉字，八百余字；碑阴为女真大字，一千五百余字，内容相同。此碑是世存女真文碑中文字最多，内容最为重要的一块。

元代，扶余属开元路。元代的遗物，仅见1964年于大三家子半拉城出土的一方铜印，印文为“都提举使朱记”，和1957年于伯都城出土的铜玉壶春瓶。

明代在东北设置三百八十一卫，在吉林境内设羁縻卫七十多个。扶余属三岔河卫，址于县西北部。县内遗址、遗物较多，在北部松花江沿岸，自西部的风华公社何廷窝堡向东经嘎尔奇、贾津沟子、至上岱吉，有城址和墓葬。出土器物有青花、斗彩、龙泉等瓷器，瓷质优良，图案优美，是中原产品。碗、盘、碟等器皿，有的印有“大明年造”的款识。墓葬中出有镞、刀、剑等武器，沿江的墓葬多与城址相邻，是守城驻军的墓地。

在扶余，一种灰兰釉青花瓷碗，十分普遍。这种器物质地粗糙，深腹侈口，坚实耐用，经专家鉴定，是明末清初的器物。

明朝建立以后，经略东北边陲，不遗余力。永乐七年（1490年），在松花江，黑龙江入海口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尔干都司，这是加强全国各民族统一的重要措施。扶余南境的第二松花江和北境的松花江是通往奴尔干都司的“海西东水路”的重要区段。沿江的墓葬和城址，说明了明朝对这条水路的高度重视以及当时航运的繁忙。

清代至民国初年，扶余的行政名称有较多变动。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伯都讷设驻防兵，移吉林副都统镇守。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今县城建县，名新城，有副都统驻城内。雍正四年（1726）于伯都讷境内分设长宁县，属盛京奉天府。乾隆元年（1736）罢县，二年改州同。乾隆十二年（1747）裁撤，以旧县地属吉林理事同知。乾隆二十六年（1761）裁巡检，改蒙古理藩院委署主事。嘉庆十五年（1810）改伯都讷厅。光绪八年（1882）改理事同知为抚民同知。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伯都讷厅升为新城府。民国二年（1913）改为新城县。三年，因与直隶新城同名，改称扶余县，属吉林省滨江道。<sup>①</sup>

清代遗址甚多。随着土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新兴的市镇和村落遍及全县，行政设施、商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业也兴旺起来。县城内教派繁多，庙宇林立，这些富有时代特点和历史烙印的建筑，凝结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心血。

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侵略势力扩展到了我国外兴安岭一带，清朝政府为了加强防御，开辟了一条由奉天（沈阳）经船厂（吉林）到黑龙江重镇瑗珲的陆路交通线。扶余第二松花江沿岸，是这条交通线的重要区段。扶余境内的驿站有陶赖昭站、逊札堡站、浩色站、社里站、伯都讷站。伯都讷站与黑龙江将军所辖的

<sup>①</sup>参见《扶余县志》历史沿革未刊稿。

茂兴站隔江相望，由此通往卜奎（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现于驿站旧址，还可以听到老人们的传说和见到一些遗物，另外，文献记载也很明确和详细。

构筑在贾津沟子河下游的万善石桥，是民国初年著名的交通设施，石桥美观实用，具有经济和历史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扶余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展开了英勇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扶余大地上，东北民众自卫军打响了抗击日寇的枪声。人民散发了传单，以唤起民众抗日的热情。193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派一批优秀同志在陶赖昭、三岔河一带活动，并建立了支部，在中长铁路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扶余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为推翻蒋家王朝做出了巨大贡献。锦州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烈士，就是扶余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人民创造了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较之文献，更具体、形象、生动地诉说着历史的发展，勾画着历史的本来面目，它是研究历史科学的极其重要的内容，扶余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